

# 新媒介时代 导演如何应对网络批评

## ——从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的舆论风波说起

高凯

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上映后不久，导演胡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较长微博，针对其精心筹备18年之久的作品遭遇恶意评分与人身攻击进行了强烈谴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胡玫导演特别提到了两位抖音UP主，认为他们是此次恶意攻击的主要源头之一。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在微博发布当天，有关影片的多条相关内容成批登上热搜，不仅让影片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也将中国电影界导演与自媒体影评人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现象推向了风口浪尖。

回溯电影史，导演与影评人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也曾谱写出诸多和谐对话的佳话。从中国第一代导演张石川的谦逊之态——“影片上映后，次日我必细心研读各类批评，从中汲取宝贵意见”，到第二代导演蔡楚生在左翼影评人鞭策下的蜕变，这些故事无一不彰显着批评对于电影创作进步的推动作用。步入新时期，影评大家钟惦柴与电影导演谢晋的交往，更是为影评界与导演界树立了典范。《谢晋电影十思》一书，不仅是钟老对谢晋艺术生涯的深刻反思，也是两人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见证。而在美国，已故影评巨匠罗杰·艾伯特则以他的专业精神与公正态度，赢得了全球电影人的尊敬。他敢于直言不讳，对佳作不吝赞美，对烂片亦能给予严厉批评，但其言论始终基于理性与责任，未曾引发与导演间的无谓争执。他的逝世，不仅令美国电影界深感痛惜，更让世人看到了影评人应有的风范与影响力。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电影的接受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短视频的快速兴起与蓬勃发展，为电影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挑战。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凭借其短小精悍、易于传播的特点，迅速成为观众或电影发烧友发声的重要阵地。很多自媒体影评人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观影风尚，更参与塑造了观众对电影的认知与评价。实际上，此次“《红楼梦》事件”并不

孤立，可以让人回想起近年来中国电影界导演与自媒体影评人之间频繁爆发的争议事件。早在2006年，陈凯歌的《无极》被胡戈剪辑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一恶搞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了陈凯歌的强烈不满，并表示要上法院提起诉讼。尽管在这场争议中，将胡戈视为“影评人”身份的话，或许牵强，但因其“以影评影”的创作方式，已经构成了“视频影评”，从这点来讲，他已经具备了自媒体影评人的属性，而这一事件无疑为后来自媒体影评人与导演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现象埋下了伏笔。随后，时间推进到2013年，冯小刚导演的《私人订制》上映后，尽管票房飙升，但口碑却不佳。面对影评人的批评，冯小刚在微信上连发多条怒气冲冲的回应，与影评人展开了激烈的口水仗，这一事件再次将导演与影评人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风口浪尖。紧接着，2014年，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2》在票房大卖的同时，也引发了影评人的广泛争议。周黎明等影评人针对影片中的价值观问题发表了尖锐批评，直指其传递的消费主义及某些道德倾向。郭敬明非但没有回避这些批评，反而选择直接在微博上转发并回应周黎明的言论，用“你看见什么你就是什么”这样直接的呛声，与影评人形成了鲜明对峙，进一步激化了导演与影评人之间的冲突。

由此，从陈凯歌的《无极》到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再到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以及胡戈的《红楼梦之金玉良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线索：在当前中国电影界，导演与自媒体影评人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现象愈发频繁和激烈。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涉及导演对批评的敏感度和反批评的方式，也与自媒体影评人评价的客观性和专业性有关。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中国电影界导演与自媒体影评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每一次的争议都不仅仅是对于影片本身的评价，更是对电影艺术、创作自由、观众审美等多方面的深刻探讨。而胡玫导演此次的遭遇，正是这一

新媒介影评生态下的一个缩影，为这一话题增添了新的注脚。它不仅反映出在新媒介时代文艺作品和创作者所承受的市场压力与舆论挑战，更揭示了当下自媒体影评人与导演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面对这一现象，我们不禁要思考：在新媒介时代，如何促进自媒体影评人与导演之间的理性对话？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健康、公正的电影批评生态？这不仅关乎到电影界的内部和谐，更关系到如何共同推动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

我们看到，在电影批评领域，传统的学术评论往往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与大众的观影体验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其受关注度也相对有限。这类评论往往拘泥于既定的理论框架之中，表达上要么显得中规中矩、循规蹈矩，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见解；要么深陷于理论、自说自话，难以与广大观众产生共鸣。

相比之下，活跃于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体平台的自媒体影评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在电影评论界崭露头角，风头正劲。一方面，这类评论借助互联网的强传播力，能够迅速覆盖并影响广大的观众群体，其影响力之大不容小觑。它们如同一面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社会各阶层的观影心声，使电影批评呈现出更加多元和立体的面貌。另一方面，尽管这类评论中可能掺杂着一些粗糙的表达和情绪化的宣泄，但正是这种真实、直接、未经雕琢的声音，往往能够直击人心，直抒观影之后的真实感受，为观众提供更加接地气、更加贴近生活的观影参考。这种真实性和直接性，正是“草根”或“大众”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自媒体影评的存在与价值，鼓励并引导其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推动电影艺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导演与影评人都应学会如何正确行使批评与反批评的权利，以促进有益的交流与争鸣，而非无意义的谩骂与攻击。导演应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善用自媒体平台发声，展现真实、专业的形象，可以通过分享创作心得、解读作品背后的故事等方式，与观众

建立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增强作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自媒体影评人在评价电影时，则应当建立在控制情绪、避免言辞过于刻薄或情绪化的基础之上。此次被胡玫点名的一位UP主，其视频内容在笔者看来是客观的，从情节、视觉、人物等多方面对电影进行了点评，实际属于正常影评范畴，并非谩骂，但是其标题“烂透！试毒《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从未见过如此歹毒的《红楼梦》电影”确实用词激烈，带有明显攻击性。

电影，作为集艺术、文化与情感于一体的复杂作品，其评价本应是一个深入探讨、相互启发的过程，而非沦为情绪宣泄或网络暴力的温床。尤其当前，网络语言霸凌的问题日益严峻，它像一把无形的利刃，不仅割裂了理性对话的空间，更在无形中侵蚀着社会的文明底线。将恶意攻击、人身侮辱等不当行为带入电影评价之中，或许能在短期内吸引眼球、博取流量，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不仅损害其自身形象和公信力，更阻碍电影艺术在健康、积极的氛围中成长与发展。夏衍先生那句“我们影评人缺乏的是：真挚的学习态度和善意的忍耐精神”，至今振聋发聩，提醒自媒体影评人应当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审视每一部作品，既指出其不足，也肯定其亮点，即钟惦柴所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电影批评与创作宛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相互依傍。这一过程，核心在于对话与理解的桥梁，而非对立的鸿沟。自媒体影评人应以更专业的视角、更理性的态度，与导演及创作者展开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共同挖掘电影艺术的深层价值。而导演们也应敞开心扉，积极倾听批评的声音，从中汲取灵感与改进的方向。唯有如此，中国电影才能在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持续繁荣。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大学与山东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培养博士后）

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中间穿过排云门，两侧对称点缀着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座重檐八角亭……画师信步行走在颐和园长廊里，第一“站”便停驻于长廊寄澜亭至排云门的第80间内檐南侧，目之所及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场景。

前一秒还是画外人，下一刻却“置身”画中景。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推出的系列国风创意微短剧《长画短说》之“鹊桥画梦”全网首发，该剧以长廊彩画为故事依托，将彩画、建筑、戏曲、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巧妙融合，通过微短剧的表现形式，以“画师+画中人”双视角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映照古今。

《长画短说》的推出，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致力于将静态的彩画立体化，用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完成新媒体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元素的创新与重构，用国风再现长廊彩画故事，很好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观众在微短剧里看到鲜活、真实、立体的中国。这是国家媒体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戏曲+新媒体”的一次全新探索，为未来创新表达方式、打造微短剧这一融媒体产品形态提供了更多创作可能。

### 以丹青为媒，影像创新让“古意”有“新颜”

何天平

何为“长画短说”？是将长廊的画用微影像的方式来凝练，是将历史的厚重以当代的表达来诠释。

颐和园长廊始建于清代乾隆十五年，全长728米，廊间的每根枋梁上都绘有色彩鲜明、富丽堂皇的彩画，数量总计多达8000多幅。而《长画短说》的“长画”不仅指代颐和园长廊的8000多幅彩画，更在内涵层面挖掘长廊彩画的宝藏精华，以丹青为媒，对其中浓缩的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进行创意品读。

历史风貌与当代话语在《长画短说》中找到了文化连接。长廊彩画中虽有园中牡丹、池上荷花，有林中飞鸟、水下游鱼，但《长画短说》却并未“纵情山水”，而是钟情于其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一幅幅构图生动、形态逼真的人物故事画，通过带有奇幻色彩的创新表达，将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缓缓述说。

长廊彩画的内涵丰富、题材广泛，《长画短说》以独到的眼光从众多的传统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与中国传统戏曲故事相关的彩画经典，通过“画师”这一画中人的视角进行剧情演绎，带领观众进入精妙的艺术世界。一步入画，一眼千年。

与此同时，短则意味着“精”。将长廊上的彩画用微短剧这样较短的篇幅讲述出来，不仅打破传统赏画模式，也让《长画短说》在有限的时间里更为品读长廊彩画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节目虽是透过画师的视角走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但这样的走近却体现着高度的贴近性、鲜活感，尤其是有意地将当代年轻人的目光和视野一并纳入其中：既是面向年轻人在讲述，也采取了年轻人能够移情、共情的讲述方式，以影像创新为厚重的历史文化注入了当代人鲜活的思考和智慧。

### 以文化为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焕发新活力

如今，颐和园内每天都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览这座昔日皇家园林的宏伟与沧桑。但，有多少人为了长廊而来，又有多少人为彩画驻足？为了全方位展现长廊彩画的文化内涵，《长画短说》虽以彩画破题，但并未局限于彩画本身，而是通过创新融合多种艺术形式，“让彩画活起来”，带领观众品味彩画背后蕴含的精神内涵，品味传统文化精髓。

画师因追寻“入画”，亲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聆听悠扬婉转的黄梅戏腔；也因深情“作画”，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岂在朝朝暮暮”的吟诵中，舞成画也成。与此同时，由优秀青年黄梅戏演员潘梓静、张小威联袂打造的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也将有关爱情的美好变得具象起来。

一笔一墨，承载的是古建筑中的文化韵味；一歌一咏，传颂的是流传至今的文化精髓。《长画短说》在彩绘长廊中探寻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激活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探寻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精神源泉，真正帮助人们读懂国风、国潮汹涌来袭背后的文化自信。通过丰富多元的表达形式，《长画短说》让观者以更亲切、更直观的方式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打造出长廊彩画文化新符号。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解构与再创造，以文化为体，让传统可知可感，赋予文化经典以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与全新生命力，也形成一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为同类型创作提供了具有代表性、引领性的积极探索。

### 以融合为向，技术赋能创作传播创新

在诗意化呈现唯美意境的同时，《长画短说》也通过技术赋能，让彩画“活”化成立体、灵动的沉浸式场景。织女在夜空中与牛郎遥遥相望，竹林飞鸟与画师舞蹈的配合相得益彰，随着云中鹊桥缓缓搭起，“有情人”终能“人间天上不分离”……当传统长廊彩画用现代科技和国风舞蹈被再次“重绘”，《长画短说》不仅让中国古典园林中古建筑彩画的万千锦色，以新的艺术形态焕发出时代光彩，焕新中国传统东方美学，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更加鲜活、立体。

以“彩画”为线索，《长画短说》用“微而不凡”的微短剧提炼文化遗产背后的灿烂文明，勾勒文化脉络，仰望璀璨星河，让观众看到了传统国风与现代表达的创意结合。在吸引更多人们走进并感受颐和园的文化魅力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发现颐和园这座历史遗迹的文化价值。而借由总台传播矩阵，《长画短说》也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优势，实现大小屏联动的一键触发，推动节目在更广泛的年轻观众群体中展现长廊彩画的文化内涵，也让人们看到融媒体创作传播创新的“国家队”风貌。

既有好内容，也有好传播，一个鲜活的文化样本得以跨屏展现。《长画短说》以彩画话中华，沿着长廊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琳琅，让观众得以深入了解彩画的历史底蕴，充分领略独具内涵的文化遗产，是创作者“推动文化繁荣，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积极实践。藏在长廊彩画中的生动故事与美好情感有待于被更多讲述，《长画短说》的影像魅力同样值得被投以更多的期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

# 越平静越有力

## ——评电影《我和我母亲的疼痛》

刘海波

笔者有幸提前看过入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电影《我和我母亲的疼痛》的剧本，彼时就被剧中的母女深情和生离死别深深打动。看过电影，更是惊讶于影像对文字惊人的还原度，脱口而出“中国电影终于也有了高级审美”。

影片捕捉到了一个终于降临到80后一代中国人身上的问题——即最早的80后，也是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近中年，他们的父母已届老年，生离死别的时刻陆续来到。

片中的主人公赵敬是个在北京工作的图书编辑，也出版过自己的书。丈夫林木是个摄影师，两人虽然已是四十上下，但都忙于事业，过着丁克生活。突然一天，赵敬的生活平衡被打破，她远在云南的母亲被查出患癌。作为独生子女，她别无选择，只能搁下手头的工作，立刻启程回家照顾母亲。起初母亲身体尚可，赵敬跟着母亲去了当年父母共同搭建的边疆小县医院，父母在那里结合，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没能等来调回昆明，就死在了那里。在边疆，女儿从父老乡亲口中一点点了解父母的青春、爱情和奉献。此后，母亲随赵敬一起返京治疗，赵敬和林木还特意换租了大房子。母亲的几位闺蜜曾来京探望，几个老姐妹一起开间饭馆，作为E人的母亲也曾闯到赵敬的单位，与她的同事们聊得甚欢。一家人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时光。几个疗程后，母亲坚持回昆明。

一年很快过去，又到了年底。这个世上没有幸运，赵敬再次收到消息，母亲已病重。当时她的一个提案刚刚获得肯定，公司甚至专为她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独生子女家庭没有备案，赵敬思索再三，选择了辞职回家照顾母亲，好在她得到了丈夫林木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在母亲的最后岁月里，赵敬陪伴母亲，见证和感受着母亲的疼痛。病人的最后一段时期通常是急剧恶化的，母亲未能赶上自己安排的好与好友的告别诗会，在赵敬梦见母亲回家又

从剧情、表演到镜头语言、剪辑节奏上的平静与克制，是该片美学的高级之处。图为影片《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剧照



给她煮了一锅汤的时刻离世了。

这部电影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人，首先在它对生活现实近乎百分之百地复刻。这里没有意外，没有戏剧性，只有冷酷的真实：人到中年，必然要经历的生离死别；独生子女，躲不过的事业与亲情两难选择；一个癌症病人，很难突破的一年存活。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些是一代代人们都在重复的老路，我们无法躲避，也未能幸免，唯有身不由己，循着常规，四处求医问药，消耗着病人也消耗着家人的体力和精力，做着无望的挣扎。

然而，这个过程是无意义的吗？当然不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陪伴父母治疗，感同身受父母的疼痛中，我们获得了成年后不多的再次与父母共处的机会。我们更多了解父母，感受无可替代的父母之爱，也回报父母，体会人间最可宝贵的血缘亲情。这段既酷的经历让我们的一生更丰富、圆满，既不至于留下终生的亏欠与愧疚，也让我们更清醒地看懂人生，看到她的残酷与美好。

《我和我母亲的疼痛》是一部既不需要观影门槛，又很需要观影门槛的电影。

说不需要，是因为影片表现的是我们最熟悉的人之常情，说需要，是因为它拒绝了观众熟悉的商业化的戏剧性套路。在美学上，影片选择了“平静与克制”。主角赵敬是个留着干练短发的职业女性，长得清爽沉稳，话不多。当年是她自作主张把父母起的名字“赵敬”改成了很多人不认识的“赵敬”，并坚持留在北京打拼，这是个坚强的有主见的主人公。她的母亲显然也曾经是位强势的女人，年轻时被两个男人爱着，冲动之下就下了乡，女儿也是为了躲避她的强势才坚持远隔。

虽然母女曾经彼此远离，影片没有刻意建构人与人之间冲突，留下的是一家人与病魔之间咬牙坚持的消磨战。所以，影片只有如水的日常，有一个个相处的细节。然而，越是平静，越有力量，后劲越足。母亲咬牙坚持也忍不住发出的疼痛的呻吟；母女二人并排

躺在床上，紧紧握住双手的对望；女儿埋葬了母亲后，与乡亲们走在山路上彼此呼喊者名字。这些看似日常的细节是如此催人泪下，因为它真实又真诚！好的艺术品无需修饰，总是直白示人，因为最动人的永远是生活本身。

当然，那些未曾体验过、或者尚不能感受和理解的深沉亲情的观众，那些习惯到电影院里观看打打杀杀、追求嘻嘻哈哈、要求放松爽快的观众，或许会抱怨影片节奏的舒缓、情节的平淡。但在笔者看来，从剧情、表演，到镜头语言和剪辑节奏上的平静、克制，恰恰是这部电影美学的高级之处。中国电影里这种洗尽铅华、回归本真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样的电影出现，是中国电影人自信的表现，《我和我母亲的疼痛》能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电影节品位的体现，如果她能被更多的观众认可，则一定是中国电影观众成熟的表现。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